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国现实 经济问题的探讨*

——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洪永森 陈国进 方颖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8年9月20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会聚鹭岛,共享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盛宴。

论坛开幕式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森主持,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顾问、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洛林分别致欢迎辞。《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作论坛工作汇报,强调了本次论坛宣讲论文的高质量和会务组织的高效率。此次论坛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刘树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松,分别做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虚假的货币战争,真实的财富战争》、《转轨失调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2009年展望》的主题演讲。

根据征文主题,本次会议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和中国经济四大专题领域,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一、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在经济增长方面,于洪霞采用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如何做出参与国际分工的决策,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决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邹卫星、房林将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引入最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通过资本在效用中权重、生产外部性、生产效率、劳动增长率和折旧率的比较分析,结合理论模型,解释中国宏观经济及其变动。

在国际贸易领域,蔡洁和庄宗明采用29个国家1991—200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法实证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和平有推动作用,该文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大陆和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增强与两岸和平同样有因果关系。陈丽丽借鉴A&H模型(1999)并考虑了市场竞争,用中国产业层面数据测算出FDI溢出效应与市场选择效应,结论表明: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市场选择效果显著;开放度高的产业外资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

* 洪永森、陈国进、方颖,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gjchen@xmu.edu.cn。作者感谢厦门大学研究生易金超、王磊等提供的帮助。

响越显著;产业间溢出效应大于产业内溢出效应。

在税收和财政政策领域,庄子耀、崔小勇在一个扩展的最优税收模型中讨论了最优税收理论的“最优”和“次优”分析框架,并在一个基准的动态最优税收理论模型中考察了次优税收政策的不一致性。该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财富攀比效应”引入到基准的动态最优税收模型中,得出次优税收不为零的结论,从而与现实经济更为接近。王立勇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理论推导,并利用区际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理论推导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宋小宁、杨治国针对征地与发展制造业之间的联系,从财政收入与短期经济增长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政绩考核激励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和短期经济增长,进而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框架下实施农地征用获得预算外土地出让金;同时,在征得的土地上发展能带来大量预算内财政收入和短期经济增长的制造业便成为地方政府自然的选择。齐福全利用空间自回归方法检验了两种情形的财政竞争,并得出结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表现为相互模仿,尤其是东部12省区存在着较强的模仿,但并未表现出稳定的“领导者—跟随者”模式,而部分省区在财政竞争中则表现出“领导者”的角色。方红生、张军利用中国28个地区1994—2004年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模型对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政府竞争对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边际影响是制度约束的函数。

在货币政策方面,郭辉铭、赵杨通过对货币政策变量、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VAR估计,发现我国的市场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央行奉行一个稳定性的货币政策,通胀是央行的首选货币政策目标。赵雪、刘莹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了1997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应。计量结果表明,在1997年1月至2002年1月间,M1相对于利率来说是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而短期利率在1999年8月至2005年8月间更为明显地影响中国经济。董直庆、王林辉利用小波变换的频带分析方法,选取1991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样本区间研究通货膨胀和证券市场周期波动关联性和条件溢出效应。检验表明,中周期通货膨胀与证券市场条件波动具有双向溢出效应,长周期波动只存在通货膨胀对证券市场的单向溢出效应。苏蕊芳、胡日东应用多元GARCH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地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曲晓燕、任泽平、杨建龙利用成本传导能力模型,设计了成本传导能力指数(CTC)及其变动指数(VCTC),并实证测算了包含32个行业部门的中国CTC和VCTC指数。通过与行业利润对照发现,CTC及其变动指数VCTC能够较好地反应各行业转嫁成本上涨的能力及其变动情况,是定量研究通胀环境下行业景气的基础性指标。

在收入分配领域,刘晓峰、曹华通过建模揭示了通货膨胀与收入分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种关系暗示了一个不会导致收入平等恶化的“最优”通货膨胀率的存在。文章的结论是,在不完善的信用市场条件下,长期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也将扩大。尹虹潘建立了一个两地区、两要素的模型框架,主要探讨了要素协同生产与多要素区际流动的情况,以及要素自发流动和地区政府干预对区域发展路径的影响。在论文给定的条件下,模型揭示两要素流动最终会形成某种“循环积累”机制,结果是“单极均衡”。不过,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则可能改变区域发展的路径。

二、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在博弈论领域,谢志平利用博弈理论分析人类社会为什么要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探索货币购买力本质的基础上,探索人们的通胀预期、货币数量变动等因素对货币购买力波动的影响,然后

分析货币危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杜中明认为,两个同等能力候选人,获胜后不论是进行转移支付还是提供公共品,如果他们的资源或能力相同,则该精选博弈没有均衡解。这与已有文献得出两个候选人在多数票制竞选中有一混合均衡解的结论不同。黄凯南通过深入研究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这两种理论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尝试考察两种理论存在的互补性和差异性,揭示演化博弈在经济演化分析中的作用与局限,进而理清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在劳动经济学领域,陈文府利用 2005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5)数据,研究了中国居民工作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在工作满意度性别差异的决定因素方面,男性和女性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关键的差异在于劳动时间。孟德锋、张兵、王竖秋采用 2000 年和 2006 年北卡罗莱大学提供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江苏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通过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 DID)分析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负向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罗凯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 CHNS)数据,应用 OLS 和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子女个数和出生顺序结构与子女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雍家胜认为徽商由其宗族制度和宗族隔离所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与晋商和甬商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之间的文化信仰差异是解释明清时期徽商在盐业上取得辉煌的关键所在。邓伟运用博弈论理论,建立一个共同代理模型,并将其推广至动态情形,来对“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两种经济改革模式进行探讨,试图分析利益博弈与经济改革的路径关系。报告认为,改革本质上是对社会各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山立威、甘犁、郑涛通过收集来自新浪网上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向 5.12 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捐款的经济动机和影响因素,指出公司捐款行为是符合公司的经济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卢远瞩讨论了关于盗版或者非法复制或者伪造原创商品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论题。他认为,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比较低的环境下,准入对于原创厂商是更加有利的,而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比较高的环境下,限制对于原创厂商则更为有利。史宇鹏通过对中国的 FDI 企业分析来研究来自不同法律起源的投资者对法律体系的适应性行为。结果表明,来自普通法国家的 FDI 与来自大陆法国家的 FDI 企业相比,外商的出资比例更小、债务比例更高,同时经营年限更短。但是,不同法律起源的 FDI 企业的利润回报并没有出现显著性的差异。

在市场机制方面,冯巨章以反倾销应诉为例,考察了在市场环境和商会介入下企业间合作网络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市场环境下的企业间合作应诉网络规模往往较小,而商会的介入能有效地扩展企业间合作应诉网络规模,商会也可视为反倾销中企业合作应诉的重要机制。周翔翼、赵珏航、姬升良依据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背景,建立了混合寡头市场结构下的有限价格(limit pricing)进入遏阻模型。研究结论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国有银行都会选择容纳私营银行的策略,但在存款竞争的某些参数假设下,国有银行的双重目标之间存在矛盾。程明明、邢春冰利用 2004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香烟消费影响因素及相关经济行为。作者指出,影响我国城乡居民香烟消费的因素除了部分基本特征变量如年龄和婚姻状况外,还有受教育水平与被调查者的工作状况等。

在微观经济学其他领域,蒋仕卿、陆铭、陈钊、佐藤宏研究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存在同群效应,并且同群效应的大小随着社会互动的强度变化而变化,在信息交流上互动强度越高的家庭,同群效应的正效应越高,而在劳动力市场互动强度越高的家庭,同群效应的正效应越弱。汪汇、陈钊、陆铭利用在上海收集的 2006—2007 年“和谐社区与社会资本研究”数据库,分析了居民信任水平的

决定因素,并重点研究了户籍身份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更加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更低。并且,本地户籍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消失。辛清泉实证调查了政府控制和市场发展对中国上市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内部资金充足时,投资随着内部资金减少而下降,当内部资金不足时,投资随着内部资金减少而上升,说明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存在“U”形关系。

三、金融经济学及其实证研究

陈国进和张贻军以1997—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动态剩余收益估价模型估计我国股市的基本价值进而给出股市泡沫度量,并在此基础上,检验我国股市泡沫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相对于通胀幻觉,我国股价泡沫主要沿着再售期权机制形成。顾洪梅、刘金全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度我国15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的X-低效率,结果表明1998年至2003年这6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X-低效率水平显著上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尤为显著。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加强各项管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激励和约束政策。马理、黄宪、代军勋通过多边博弈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商业银行确实在经营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信贷结构行为偏好,而且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的影响非常巨大。资本约束越严格,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越大,经营越稳健,风险越低。

在公司金融领域,潘越、戴亦一以我国“A+H”两地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双重上市的公司信号示意效应。研究发现,在A股市场上,双重上市公司通过好的信号示意取得了比只在A股市场上上市的公司更好的融资效应。郑志刚认为中国上市企业行政赔偿的增加可以归因于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这是由于管理层不得不放弃他的部分私人利益来增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蔡卫星、高明华、曾诚采用中国A股市场的相关数据,通过追溯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从关联交易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对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利益侵占的水平就越高,控制权具有“壁垒效应”。曹廷求、钱先航、李维安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评价基础上得出的治理指数2003—2005年的数据,对上市公司治理状况与公司价值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司治理的改善会导致公司价值的显著提升。刘康兵、Elmer Sterken从实证方面考察厂商面临融资约束时的营运资本和固定资本投资行为存在两个可检验的预测:第一,当营运资本投资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固定资本投资模型时,其估计系数应当为负数;第二,应用传统的组内估计法进行分析可能会低估现金流对固定资本投资的总量影响。刘康兵应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证实了上述预测,从而为融资约束假说及其数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在金融市场领域,才静涵、欧阳红兵利用Barclay and Warner(1993)所提出的模型,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中国熊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熊市时,具有私人信息的投资者仍然会在中等规模的交易中表现活跃。Sung Y. Park、王文敦、黄乃静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金融传染进行检验,认为在分位数模型下的单边Rao's score检验渐进地服从混合卡方分布。在此基础上,文章展示了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结果显示,该统计量较文献中的统计量具有更好的性质。游家兴、郑挺国采用非对称M-GARCH模型,并应用Engle(2002)提出的动态条件相关方法(DCC)捕捉市场间时变相关系数,在引入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市场1991年至2007年的17个年份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动量效应,美国证券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反转效应,

而动量和反转效应在香港证券市场表现都不显著。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以 1999—2004 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 504 个民营企业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的政府背景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都要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Zongwu Cai、陈琳娜、Ying Fang 采用了含有虚拟变量的 GARCH 模型和时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三次政策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均值和波动性的影响。徐少君和金雪军在构建我国各地区金融排除指数的基础上,对金融排除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 SYS-GMM 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吴江、徐国柱采用财务指标评价法中属于客观赋权法的熵值法,以 2003 年发生资产重组的 163 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 2002 年至 2007 年的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陈国进和王磊的研究表明,证券投资基金动量交易行为加重了股票惯性,但股票价格在长期实现逆转,说明是基金的错误定价而非市场风险导致了收益惯性。动量交易只是基金交易行为的一个方面,基金整体交易行为能引导信息传播。因此,投资基金的动量交易行为阻碍了市场效率,但投资基金在总体上发挥着提高市场价格发现能力的作用。李成以 2000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企业所得税分权改革对地方税务机关征管积极性的影响,以及税收机关征管积极性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的影响。侯成琪以战略资产配置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投资机会集的时变性角度来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溢价之谜。于李胜和王艳艳以上市公司盈余公告的集中程度作为切入点,基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注意力分散假说”和“投资者知觉负载假说”,以投资者的即时市场反应和滞后反应为标杆,研究了信息的竞争性对资本市场中信息传播效率的影响。朱彤、叶静雅借鉴 Chen 和 Hong (2006) 事件研究的方法,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日度机构持仓数据,对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评级发布日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存在着以正反馈交易为代表的羊群效应特征,并且短期交易还有一定的惯性特征。

四、中国经济专题

在经济政策领域,章泉采用了 Driscoll 和 Kraay (1998) 发展的横截面依赖特征的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 1997—2001 年间城市级别的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成本。经检验发现,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指标的城市化定义对环境质量具有正效应,而以建城区面积为指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对环境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杜卫华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与福利计量的关联模型,利用上海市 1953—1998 年基于网络的区域经济增长分析 PSE 模式核算数据,对照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围绕 1960 年和 1978 年两个自然灾害年,进行经济核算和国民福利计量的比较分析,寻求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经济体的发展特征和演化规律。王伟华借鉴人力资本价值评估理论,依据我国现有统计体系所能提供的数据支持情况,采用预期收益法,建立了一个简化的战争人力资本损失评估模型,并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的人力资本损失进行了实证评估。

在经济增长方面,周晓艳、韩朝华采用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运用中国 29 个省区 1990—2006 年面板数据,估算各地区生产效率并分解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刘轶芳、蒋雪梅研究了传统的份额-偏离模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收入差异分析中的缺陷,重点阐述了文章中新引进的可传递三因素份额-偏差模型,证实了高劳动生产率和持续的劳动力流入(即正向作用的影响)是造成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主因。陈钊、万广华、陆铭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的行业收入不平等现象分析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和看法,阐述了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率。文章运用 CHIPS 数据,并创新性地引入了基于个人的收入决定方程和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析。

在农村经济领域,张良悦、师傅、刘东使用效率 DEA 和超效率 DEA 方法对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快速的城市化对我国农地非农化和耕地保护形成巨大的压力,城市土地的低效利用是造成我国耕地快速消失的原因之一,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对我国耕地的积极保护。严成樑、周铭山、龚六堂利用 1998—2006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知识生产函数中知识存量对应的指数显著小于 1,从而我国的现实经济更支持 Jones 的知识生产函数。汪冲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了环境、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四种基本公共服务在产出水平、消费可及性和个体效用化水平三个角度上的城乡差异,并就其公共服务间的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比较。王麒麟以“农户的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是不可分的”为假设前提,分别从农户消费行为和农户生产行为两个方面加以阐述,认为农户可能在生产收入的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可能在最低效用的约束下追求生产最大化,因而可以依据这两个思路运用最优化方法分别对农户消费行为和农户生产行为作详细分析。

在区域经济学领域,李青原以 1999—2006 年间我国 30 个地区 27 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 Wurgler (2000) 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以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并运用系统广义矩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但地方政府的干预却妨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钱学锋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 GMM 方法,考察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得出了国际分散化生产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的结论。研究还显示,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状况不能有效促进集聚,这说明“政策租”而不是“集聚租”在东部和中部的工业集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樊福卓构建了地区专业化系数等度量指标,把地区专业化的实证研究从封闭经济推进到开放经济(地区角度),从孤立系统推进到开放系统(行业角度)。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经济假设下还是在开放经济假设下(地区角度),以及无论是在孤立系统假设下还是在开放系统假设下(行业角度),长三角工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均较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张杰、刘志彪运用江苏省的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的计量方法,实证地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张学良运用非参数 DEA 分析方法,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四部分,然后利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技术,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经济增长率与这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

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共接受了 131 篇论文。与往届相比,虽然本次论坛应征论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论文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是选题还是分析方法,足以说明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不断追求卓越的品质。

本次论坛中,不仅有大量关注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论文,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论文试图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或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上取得创新。更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在读博士生与硕士生加入到本次论坛中来,显示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论坛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芝山)